

李贽“童心说”的心学渊源与理性超越

马晓虹 张恩普

摘要：李贽的文学思想对晚明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探讨了李贽文学思想的核心“童心说”与阳明心学的渊源关系，并论证了“童心说”在主体思维和文学审美上对阳明心学的超越。

关键词：李贽；“童心说”；阳明心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105-04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哲学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亦是文学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其间，哲学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作为明代哲学思想的代表，阳明心学产生于明嘉靖后期，它的出现和盛行，使明代哲学、文学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前期占封建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的势力渐弱，而倡导“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阳明心学逐渐被晚明思想界、学术界和士人所接受和推崇。在这一哲学思潮影响下，以李贽为代表的、承袭阳明心学思想脉络的一批晚明文学家，高举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要求张扬自然人性，文学理论和创作出现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景象，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清代。在众多受心学思想影响的文论家中，李贽可谓是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影响重大的人物，他融贯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和自然人性的文学主张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财富，他的“童心说”与阳明心学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一、“童心说”文学思想的心学渊源

李贽是明代十分著名，却又卓尔不群的思想家、文论家，但这样一位学术思想卓立的先锋人物却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没有收录，我们从《李温陵传》的记载中依稀可见其人格特征：

李温陵者，名载贽。少举孝廉，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校官，徘徊郎署间。后为姚安太守。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①

由此可见，作为思想家的李贽，为人狂怪，倜傥不驯，在晚明的思想领域独树一帜。对其独特的性格特点，袁中道有一个贴切的评价：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壁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常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汨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鸩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所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矣。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若夫幻人之谭，谓其已髡发，仍冠进贤，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谓蟾蜍掷粪，自其口出者

收稿日期：2009-07-01

作者简介：马晓虹（196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张恩普（1954-），辽宁兴城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①李贽著《焚书·续焚书》，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第275页。

也。^①

这种“好刚使气”、“快意恩仇”的个性使得李贽的文学观更注重主观心性的抒写，追求自然真情。他的思想与文学见解卓而不群，因而被晚明士人狂热地追随。李贽提出的“童心说”既是他哲学思想的概括，又体现了他文学思想的核心价值，从文学主体到创作表现，直至对“圣贤之道”和“天下至文”的颠覆性理解，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他把“离世而隐”的淡泊与“徘徊人世”的关注合二为一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印证了他思想体系当中与心学思想密不可分的关系。李贽40岁时接触了阳明心学，这对他的文学思想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贽在四十岁时的人生转折是直接接受阳明心学的启迪而发生的。这一年，他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埋葬了祖上三代的五口灵柩，完成了一位儒家士人所应负的人生责任。”^②他在读王阳明、王龙溪等人的书的同时，也在对先秦诸子的著作进行研读，使他的思想，特别是文学思想中兼有儒、释、道的成分，而尤以阳明的思想对其影响最深。阳明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在李贽那里得到了认同和共鸣，二者皆有世人眼中的狂狷之气，又都游走在隐而悟道和济世救民之间。在《王阳明全集》中，对阳明在少年时（12岁）对人生的思考做了记述：“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③可见，读书、思考人生价值、做圣贤是王阳明的人生准则，也体现了他领受儒家思想的渊源。李贽正是从王阳明那里找到了对世界本原和人生价值的认识，他的“童心说”在接受心学并不断地对心学进行体悟当中，从文学的角度对心学进行了价值认同和解读，并在文学批评领域理性地发展了心学的观点，体现了既渊源于心学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又超越心学的文学审美的认定。

二、“心之初”与“心即理”

李贽“童心说”的提出，实为针对当时文坛上到处充斥的伪道学的论调，在李贽看来，文章的虚假之气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文学的主体究竟

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一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所体现出的文学的主观心性由此可见一斑：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④

李贽认为所谓童心是“心之初”，是童子的最初之念，而失去童心的原因是因为内心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即“道理闻见”，李贽提倡童心，是为了恢复人的真心，反对以“闻见道理”为心。在李贽看来，“心之初”是美好的，后来由于“闻见道理”才使人的本心被障，而“闻见道理”又是“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有纯真美好的童心了。在《童心说》里，李贽一再强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夫童心者，真心也”，把毫无虚假成分的，最纯洁、最真实的“赤子之心”奉为真心。明显可以看出，李贽对当时只见虚假的“道”，而不见真实的“心”之根源进行了反思和剖析。

人在失去本真的童心之后，其后果和影响会怎样？李贽紧接着论及假人、假事和假文问题。“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⑤因失却真人，所以成了假人，假人当然只能做假事，至于做文，也只能做假文。假人之文不是由内

①《焚书·续焚书》，第275页

②左东岭著《阳明心学与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49页

③《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1页

④《焚书·续焚书》，第98页

⑤《焚书·续焚书》，第98页

在真情表现出来的，当然不能“笃实生辉光也”。

李贽所指的童心的内涵在这里已经有了两方面的意思，它既是指人最初的本心——初心，最洁净无瑕的状态，也指最自然真实的表现。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既是创作主体的主观心性的纯净，心无杂念，也指创作主体在进行创作时的真情流露。

对比阳明心学在对“心”的阐述上的观点，可以看到李贽文学观的心学轨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心即理”是从宋明理学的“天理论”衍生而来，针对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之“心”观，阳明把二者合在一起，认为“心即理”，也就是在对心本体的认识上，把持着心的同一性的观点——“心外无理”。但以“理”笼而统之地概括全部的天理，又似有不及之处，所以阳明把心又分为“得其正”的道心和“失其正”的人心：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无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①

从这一点上看，阳明的“心即理”的“理”的旨归依然是宋明理学的“理”，内涵并没有很大差异，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差别在于阳明心学求理的方式是反观人的内心，向心内求理，认为“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②阳明把这种存在于人内心的天理明确为“知”，可见心学对客观世界体认的主体思想已经很明确了。而这种哲学观直接影响了李贽对文学创作的主观心性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李贽的“初生婴儿般的纯真童心”的观点缘自于道家：“因其初主之来源显然与老、庄影响有直接关系。老子之婴儿实与道、自然及朴之义同，故老子之人生目标便是见素抱朴，亦即‘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相’（《老子》二十八章），一句话，归之于浑沌虚无。”^③笔者认为，前面说过李贽的思想既得于禅的体悟，也得于道的虚无，但如果从阳明的本体思维出发来看，阳明把未受杂染的心看成是世界的本源，既然文学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李贽把心看成是文学的本源就顺理成章了，从这一点上说李贽的“心之初”也得之于阳明的“心即理”。

三、自然之文与良知理性

李贽从真心、真人导出了真文的理念，认为，倘若世间之人皆能做真人，都怀有童子之真心的话，那么发诸于真人、真心的文章就是真文，即自然之文。这样真人——真心——真文，形成了逻辑顺序严密的思维链条，使李贽的“童心说”在文学创作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关系是“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④人无真心，更何谈发于真心的文章呢？“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⑤从自然人性论到自然文学观，李贽把对阳明心学的良知理性论推及到文学思想领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如《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⑥文学表现人的内心要遵循自然的原则，既然人的心性 is 自然的，是童真的，那么文学应是这种童真之心的自然表现，是不应加以任何外在的阻碍和人为的限制的。

李贽的此种观点在阳明心学的理论中可以找到支撑。阳明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⑦王阳明强调了良知与感性的自然联系，只要我们求是于心，便可获得良知，即知即行，便可达到致知的目的。而那些外在的规范只会束缚人的良知和欲望的表达，因此需要听从于“心之本体”的召唤，自然地表露自我，完善人格。李贽“童心说”正是在这点上搭上了阳明心学的脉搏，用自然的心性实现文学对道德的完善和人生价值的超越。

①《王阳明全集·卷七·重修山阳县学记》，第256页

②《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2页

③左东岭著《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④《焚书·续焚书》，第97页

⑤《焚书·续焚书》，第98页

⑥《焚书·续焚书》，第98页

⑦《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6页

四、“童心说”对心学的理性超越

作为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李贽的哲学和文学思想与阳明心学有着渊源关系。心学盛行后，晚明文学领域一扫之前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阴霾，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渐强。其中李贽的作用非同寻常。他的价值不只在于其脱胎于阳明心学的理论根系，更在于他超越心学的文学主体思维和审美价值判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正视私心人欲。在李贽之前，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界在谈到“私心”、“人欲”概念时，多是要去“私心”、灭“人欲”。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此有过评注：“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皆去声。唯之为言独也。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①这里强调的是成为仁者的标准当是没有私心。“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结上文两节之意，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行，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②阳明的心学思想中去私去欲也承续了传统儒家学说的观点：“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③“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④，在他们看来，私心和人欲的存在会蒙蔽人对天理的寻求，因此对于求圣以达天下的儒子来说，存理去私灭欲应成为恪守的准则。而李贽对理学的反叛，对心学的发展，正在于他能从“本真”和“自然”出发，正视私心和人欲的存在，也就是正视有功利思想是人的本性，并且认为这是“心之初”的自然流露，无需克制，进而对传统的伦理进行了反拨式的阐发：“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⑤这种人伦物理使对物质生活的私欲和追求成为人之常情，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

圣人，都不能免除这种私欲，所以私心的客观存在具有合理性。引申到文学领域，文学创作也应该表现常人的感情：“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⑥“自然发于情性”之文，是出自童心的至文，是真正值得倡导的文学观。

（二）追求审美体验。阳明心学之中含有审美的元素，体现在他对善和恶的认识上，认为良知即是善，是美，求善即是获得良知，以达圣人之境。在阳明心学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善”和“恶”这两个概念既是“心之体”，又是“意之动”，对“善”和“恶”的认识，既体现了致知的过程，又体现了格物的目的：“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⑦而李贽的“童心说”则在为“天伦物理”的概念正名之后，又提出了文学审美的要求。文学除了要表现自然人性外，还要具有审美的要求，而“天下之至文”就能达到这个要求，即达到“化工”的境界：“《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⑧文学创作要追求“化工”而非“画工”，“化工”的境界可使“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⑨，由自然之性情生发而出的诗文，便可至美，因此“宣畅”、“疏缓”、“浩荡”、“壮烈”、“悲酸”、“奇绝”之境便可呈现，且与审美主体的情性相一致，由性而发，便“莫不有情”，“自然发于情性，自然止于礼仪”。

综上，“童心说”是李贽文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对晚明文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童心说”的提出，是心学思想影响文学领域的表现，是李贽接受阳明心学的核心价值，又在文学思想上超越了心学的理性维度的表现，自此，对主观心性的观照、对个性自然的抒写、对文学审美的追求开启了晚明至清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崭新风气。

（责任编辑：闫丽）

①朱熹《四书集注》，湖南岳麓书社，1985年，第94页

②《四书集注》，第243页

③《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2页

④《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3页

⑤《焚书·续焚书》，第4页

⑥《焚书·续焚书》，第97页

⑦《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第117页

⑧《焚书·续焚书》，第96页

⑨《焚书·续焚书》，第96页